



屠格涅夫选集

贵族之家



屠格涅夫选集

贵族之家

磊 然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И.С.ТУРГЕНЕВ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4 年版
《屠格涅夫十二卷集》第二卷译出。

责任编辑：张福生

贵族之家
Guizuzhijia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5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6 $\frac{3}{4}$ 插页 5

195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3 年 2 月湖北第 2 次印刷

印数 15,481—23,940

ISBN 7-02-001154-3/I·1079 定价 4.50 元

译 本 序

一八五七年底，屠格涅夫在一封信里，说自己正处于一生“转折”的“刹那间”。他写道：“我行将四十岁了；不但第一期和第二期的青春，就是第三期的青春也已经消逝——是时候了，我即使不能成为干练的人，至少也该成为知道往何处去并达到何种目标的人。我不能成为别的，只能作一个文学家——而迄今为止，我更多的只是半瓶醋。往后不会是这样了。”预言实现了，他很快写出了《贵族之家》。批评家安年科夫说：屠格涅夫“作为社会的作家、心理学家和风习画家的声望，赖这部小说而终于确定下来。”的确，《贵族之家》和《父与子》是屠格涅夫的创作中巍然并峙的双峰。不过，如果说《父与子》在当时不同的社会阵营中激起强烈的争论，那么《贵族之家》则受到交口的称誉。只是在这众口一辞的赞扬声中却包含着十分歧异的见解：保守的批评界推崇它是纯艺术的杰作，进步的批评界则同时看到它的社会内容。是由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吗？不是。小说以其人物形象的内蕴证明了它并非“纯诗歌”。

《贵族之家》开始构思于一八五六年，在《罗亭》发表后不久，它反映的是一八四二——一八五〇年的俄国生活，而写成于农奴制改革前夕的一八五八年底。与《罗亭》一样，作家仍在思考贵族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问题。不同的是，《罗亭》尚在说明贵族知

识分子的历史作用，这里则是反映他们的退出历史舞台以及贵族阶级的趋于没落了。像往常一样，这也是通过爱情的故事来表现的。这一次是通过拉夫列茨基和丽莎的爱情故事。

费奥多尔·拉夫列茨基出身于古老的世族。这个家族的祖祖辈辈的生平是俄国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期贵族历史的剪影。曾祖父专横跋扈而贪婪，祖父粗鲁颀硕而懒散；而父亲则是一个崇拜西欧文化、脱离祖国土壤、藐视本国人民、毫无作为的空谈家。他标榜进行“激烈改革”，实则只是给农民加重租金和劳役；而在十二月党人被镇压后，这个名为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的信徒居然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可怜虫。他要把儿子、书中的主人公费奥多尔培养成斯巴达人，锻炼他的身体，同时给他注入了全盘西欧式的课程。这种畸形的教育使得费奥多尔成为远离实际、昧于世事的精神上的大孩子。父亲死后，费奥多尔虽则勤奋自学，读过许多哲学著作，无如渊博的书本知识弥补不了幼稚的生活经验。也正因此，他轻率地迷恋于瓦尔瓦拉的美貌，贸然与之结婚；在发现被她欺骗后，与之决裂，却没有离异。这一切铸成了生活上的终身大错。然而他真诚、正直、善良、朴实。他身上还流着农民的血液；母亲出身农奴。他愿意同人民接近，并同情他们的苦难。从国外回来后，说要“种地”，这也意味着他要扎根于祖国土壤。

尽管拉夫列茨基受过多年西欧教育，却远非西欧派，因此引起他同潘申的冲突。潘申否定祖国的一切，膜拜西欧的文化，要俄国整个地移植西欧的社会制度。拉夫列茨基则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关心俄罗斯民族的前途。他并不反对改革，只是认为，改革应先深刻地认识祖国，要真正抱有理想。他并非像潘申所说的是“落后的保守主义者”、即斯拉夫派；但他所谓的“人民的真理”

和“谦虚”精神却带点斯拉夫派味道。

屠格涅夫的六部长篇旨在描绘“迅速变化中的俄国文化界的面貌”。从罗亭到拉夫列茨基正是这一变化过程的一个阶段。较之罗亭，拉夫列茨基克服了“世界主义”；克服了与人民的距离——虽则还停留在思想上；克服了空谈，开始走向实践——虽然还不知道如何做，克服了意志薄弱，显得沉着和坚韧，忍受住命运的再次打击。但他也不无弱点。米哈列维奇批评他没有信念和热情，只为自己而活着，无所作为，是个博学的懒汉。话虽过苛，却也中肯。假如说米哈列维奇具有堂吉诃德精神，永远为理想服务，是罗亭的后继者，那么，拉夫列茨基，作为贵族知识分子，在这方面，较之罗亭是后退了；他缺乏社会理想和社会激情，而且开始带点奥勃洛莫夫的懒散气味，只是他还能振作起来，有所作为。

像罗亭遇到娜塔利娅那样，他遇到丽莎，并为她所吸引。他对她的爱恋之情开始是下意识的，但却是执着的，后来才渐渐明朗化。误传的妻子死耗使他跨出了求爱的一步，在论争中战胜潘申终于赢得了丽莎的爱情。这爱情对他说不止意味着幸福，尚意味着生活的复苏；米哈列维奇说他需要一个纯洁的、天使般的人儿，把他从冷漠麻痹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他自己也指望丽莎能鼓舞他从事严肃而诚实的努力，共同走向伟大的目标。可是代替这场美梦的却是一幕悲剧！

应该看到，罗亭在爱情上的失败是由于主观的懦弱，拉夫列茨基则有其客观的原因。诚如杜勃罗留波夫指出：“他的处境的悲剧性已经不是同自己的软弱无力作斗争，而是同这样一些概念和习俗相冲突，而与这样一些概念和习俗相抗衡，确实会使最有毅力和勇敢的人也感到畏惧的。”这些概念和习俗的体现者首

先是丽莎。他不能说服她改变主意，也不能拒绝她的要求，因此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可是，还如杜勃罗留波夫指出的，拉夫列茨基从同丽莎见面时开始，始终不敢对她的宗教信仰哪怕作淡淡的劝告。这是因为，这方面的宣传（即反对宗教）“本身就是行动，而行动是他及其弟兄们（指多余的人——引用者）所害怕的。”

拉夫列茨基在爱情上的悲剧，还带有自愿承受的成分。他深感个人幸福和社会义务的矛盾，谴责自己追求幸福而忘了义务。他想：“你又有什么权利要求完美的、真实的幸福呢？……你看看你的周围吧，有谁是幸福的，又有谁在享受自己生活的乐趣？比方说，那边有个农民下地去收割；也许他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怎么样，你愿不愿意和他对换一下？想想你自己的母亲吧：她对生活的要求是多么微小，而她的命运又是什么样的？……”这里，农民的血液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俄国农民的处境也在他心中产生了影响（作者并非平白无故地让他在教堂门口看到穷苦忧郁的农民们）。这些想法使人想起在《贵族之家》写作前不久，列·托尔斯泰的一段日记：“现代受过教育的地主不可能与农奴制一起过合理的生活。”拉夫列茨基正是本乎“忏悔贵族”的想法而自愿地放弃幸福的。

由于自己的精神力量，拉夫列茨基没有因命运的再次打击而失去自持，陷于绝望，也没有因此丧失对善良的信心和行动的愿望。他终于学会了种地，并且“竭尽全力保证和巩固他的农民的生活”。他不因自己的痛苦而变得感情麻木和淡漠。面对年轻一代的无忧无虑的欢乐生活他未免感伤和怅惘，但却“并无嫉妒，并无一丝阴暗的情感”，而且祝福他们：“你们的来日方长。”

对于拉夫列茨基的这个结局，批评界有过不少曲解。在旧

俄时代，有人赞许他“善于同生活和解”，有人则批评这个形象是肯定必须“同现实妥协”。后一论点曾为杜勃罗留波夫所否定。苏联批评界也有人认为，《贵族之家》基于那种断言生活实际情况同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水火不容的宿命论，是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有人还说，屠格涅夫把幸福同义务对立，因此《贵族之家》的思想内容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相敌对，该书“终究属于反动的文学现象”。这些看法是欠妥的。屠格涅夫固然受过叔本华哲学的感染，但他同杜勃罗留波夫等人在幸福和义务的看法上的分歧，主要决定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当时的社会义务首先是改革农奴制和解放农奴。对于作为贵族的屠格涅夫说来，这些义务并非自己切身的需要，却会损害本阶级的利益，尽管他在理智上同情农民的苦难，并不反对解放农民，还率先主动在自己的农民中进行改革；而在感情上对这一切不无悒郁之感（参阅他于一八五九年致伊·谢·阿克萨科夫的信）。他还说过：“完成义务的情感是异己的、冷漠的，其中没有令人兴奋或醉心的东西。”总之，在他看来，社会义务和个人幸福是对立的。至于杜勃罗留波夫，则既是平民知识分子，又为农奴解放而积极斗争，因此，农奴制改革和他的个人幸福是一致的。无怪乎他说：“真正有道德的人能够把义务的要求和内心的需要结合起来，使得这种结合不仅成为本能上必要的，而且获得内心的愉快……”

另一个主人公丽莎是天真、纯洁、娴静的姑娘。她同周围落落难合。父亲早故。母亲玛丽亚以其感伤的情调显得感情深厚，实则心胸狭隘，目光短浅，是个相当自私和庸俗的女人。姑祖母马尔法性情刚直，心地善良，但却暴躁专横，有点令人望而生畏。潘申虽则暂时还能给她以好感，她却已感到他是“交际场的人物”，与她性格并不相投。书中的一个细节值得咀嚼：当潘申刚

刚弹完琴后，丽莎就问：“那么我们做点什么呢？”这意味着她同他很少有知心话可以深谈。事实上在开头几章里，拉夫列茨基出场之前，她没有认真同谁说过话。她的心扉可以说暂时是对我们封闭的；我们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摸不透她的思想，她的性格。安年科夫说得对，在当时她“甚至甘心把心灵和道德本性的不明确的要求和不可动摇的号召看作自身的特点和缺陷”而“对别人隐瞒”，因为在她看来，这些是“谁也不会认可，谁也没法猜透的”。不过，这不等于像他说的，她以潘申为头一个恋爱对象，表明她很少洞察力，对人们缺乏知识和了解；要是没有拉夫列茨基出现，她会嫁给潘申。这些分析是轻率的。诚然，丽莎年轻，又很少同人交往，缺乏人生阅历，比较单纯，但却并不那么幼稚轻信。在第六章，我们看到她第一次同潘申谈话，潘申这个善于察言观色、十分世故的人，却说自己“无心地”冒犯莱姆，以此欺蒙她时，她只冷冷地回答说：“我对您的了解还很少”，可见她是很审慎的。在全书中她没有同他真正谈心。她同他的关系，从恋人的角度看，相当冷淡，几乎在若即若离之间。莱姆一再说“她不会爱他”，是有知人之明的。即使没有拉夫列茨基出现，她也未必真正爱上潘申，后来她的行动足以证明。

丽莎的性格是从同拉夫列茨基接触和谈话中才真正展现的。他说她的眼睛和嘴唇很“严肃”，并这么形容她：“我最喜欢看她突然停下来，一笑也不笑地凝神听你说话，然后，把头发向后一甩，沉思起来。”我们看到，她纯真但却敏慧，她凝重却不出于矜持，她性格内向，深沉不露，耽于思考和观察，但又沉默寡言。决非偶然，她的许多话没有说完。

一次，她同拉夫列茨基单独在一起时，突如其来地同他说，您为什么离开妻子？您得宽恕她！据说，这些话曾使俄国读者感

到突然，认为是“严重失误”。当时一位批评家则断言，她以此表明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处境，表明自己对在深渊边缘上产生的爱情感到畏惧而要加以限制。这也许说得过分了些。但无疑的是，她渐渐同他习惯，逐渐有了感情，而这感情也不仅基于彼此熟悉，而是基于彼此身上有共通的、契合的东西，心心相印，于是在她的少女的芳心里，无心但却很自然地萌发了爱情的幼苗，开始关心他的私人生活问题，而这问题又显然是同她的爱情问题紧紧联系，因此并非无缘无故地一再浮现在她的心（她老早就要求同他谈了），尽管这可能是完全无意识的。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情感。无怪乎她和他下一次见面、当他提到这次谈话时，她不无为自己辩解说：“我的本意根本不是这样……”而且说着说着“不禁难为情起来”。

然而，在这个庄重而诚实的姑娘心上，新叶开始萌发时，旧叶并不轻易脱落——她不能一下子就忘怀潘申。她矛盾、踌躇，内心不安。只有在拉夫列茨基和潘申的那场论争之后，她终于完全认清潘申的个性，才毅然选择了拉夫列茨基。这选择表明了她和拉夫列茨基一样，爱祖国、爱人民，正是这些共同的思想构成了他们的爱情的基础。

屠格涅夫十分注意人物性格形成的环境。他以整个第三十五章表明，养成丽莎性格的不是别人，而是她的奶娘阿加菲雅。这个庄重、正直、严厉而又虔诚的农妇，在养成丽莎的单纯、善良的个性的同时，给她灌注了深厚的宗教观念——对她讲了不少宗教故事，使得那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的形象连同那些忍受苦难、不畏帝王、勇于牺牲的圣者们的精神，深深地印入她的灵魂深处。阿加菲雅离开后，丽莎再没有受到任何约束，几乎是独立地生活，很自然地习惯于思考。因此，她虽然“没有自己的

语言”，“却有自己的思想，走着她自己的路”。

本乎宗教感情，她爱“所有的人”，自然也要爱瓦尔瓦拉，而这是同自己的爱情互相矛盾的；因为爱情是排他的。特别是，根据宗教观念，爱有妇之夫是有罪的。所以她常常惊惶不定，在听到瓦尔瓦拉死讯后，也没有减轻自己的负罪感；她同拉夫列茨基说：“您应该关心的是使您得到饶恕！……”“您死去的妻子的影子不断追逐着我。”也正因此，当瓦尔瓦拉归来后，她把同她的会晤“作为对她的有罪的希望的惩罚”。她想：“我在她面前是有罪的。”可是她的思想感情是很复杂和矛盾的；知道不应爱有妇之夫，却始终没有抑制自己心中爱情的萌生和滋长；在准备会见瓦尔瓦拉之前，既认为自己“罪有应得”，又不禁“费力地、激动地压制着内心一阵阵辛酸的、使她自己为之吃惊的凶狠的冲动”；她使了很大气力，抑制住“憎恶的情感”才把手伸给瓦尔瓦拉，而指头却是“冰冷的”。这是宗教感情和世俗感情在她心中的强烈冲突。这种冲突直到最后也没有缓解。她相信宿命论，认为“一切都由上帝支配”，如果不幸，“只能听天”，她也信仰圣徒的受苦受难、自我牺牲的精神，终于决计进修道院。但是，她在马尔法面前所表现的痛苦，她向拉夫列茨基倾诉的自己的“心碎”，她在教堂前叮咛他“不要忘记我”，最后，她在修道院中见到他时，睫毛上的战栗，消瘦的脸的低垂，绕着念珠的手指握得更紧；所有一切表明人世的感情在她身上不断反抗着宗教的感情。

《罗亭》中的娜塔利娅最后嫁给沃伦采夫，丽莎却不嫁给潘申，这与其说由于这两个对象人品高低，不如说是丽莎更为坚决，不愿同周围环境妥协。她很快就决定进修道院，而且不声不响、不慌不忙地收拾房间、整理笔记和信札，是那么沉着镇静，显示了强大的意志力量；固然，这力量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宗教信仰。俄

国批评家奥夫相尼科·库里科夫斯基说她以其内心自由近似《处女地》中的玛利安娜，我认为，她在行动果断上更肖似《前夜》中的叶林娜。可是我们不同意这位批评家说的，玛利安娜和丽莎，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圣徒，因此同样是积极的。丽莎的禁欲主义不值得肯定。反之，我们也不能完全同意许多评论者的见解，说丽莎拒绝人世幸福，纯粹是为了宗教义务，因此她同拉夫列茨基的悲剧的根源完全在于当时沙皇统治的精神基础——宗教和宗教观念。丽莎同拉夫列茨基说：她同他都有必须履行的义务；他得同瓦尔瓦拉和解，而她则显然是进修道院，两者都是放弃人间幸福，这些义务确实似乎都是宗教的。但应看到，她还有别的动机。她同马尔法说：“一切都完了……而且我也不是头一回想到。幸福与我无缘。就是当我希望得到幸福的时候，我的心也总是痛苦的。”为什么呢？她说：“我全知道了——我自己的罪孽，别人的罪孽，还有爸爸是怎样挣来我们这份家业的……这些都须要用祈祷，用祈祷求得赦免。”这些话同拉夫列茨基说的“你又有什么权利要求完美的、真实的幸福”如出一辙，同样出于他所抱的那种忏悔贵族的负罪感，只是在虔诚的丽莎身上以宗教感情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可以与此相印证的是，《前夜》中的叶连娜在英沙罗夫病危时说：“我有什么权利得到幸福呢？”叶连娜并非教徒，却同样出身贵族。

由此可见，丽莎和拉夫列茨基的悲剧的形成还由于他们的心理——由于感到不配享受幸福，不作任何努力而放弃了它。这是没落阶级的心理。其所以产生是因为旧的社会制度已经过时，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社会关系的不合理性充分暴露，以致统治阶级内部一些心地善良、神经敏感的青年为自己的优越地位而深感不安。基于这种心理而形成的悲剧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

内容的。

《贵族之家》还有两个重要人物：潘申和瓦尔瓦拉。以他们为一方和以拉夫列茨基与丽莎为另一方构成小说的形象体系。物以类聚：与潘申谈爱的丽莎转而爱上拉夫列茨基，后者的妻子则变成了潘申的情妇。潘申是一个自私虚伪、附庸风雅、工于心计、巧于钻营的俗吏，瓦尔瓦拉则是一个轻佻风骚、腐化堕落、追求享乐、没有心肝的荡妇。他俩的共同点是心目中没有祖国一切的、彻头彻尾的西欧派——一个是向西欧文化拜倒，一个是整个身心为西欧“文化”（实际上是巴黎的摩登）所腐蚀，臭味相投，因而一见“钟情”。以简洁著称的屠格涅夫决非徒然地花了不少笔墨，把他们描绘得淋漓尽致。这是为了表现小说的另一主题：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这个问题也正是拉夫列茨基与潘申生活的年代（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所热烈争论的问题。通过两类人物道德优劣的对比，拉夫列茨基和潘申的辩论，尤其是拉夫列茨基在辩论后赢得丽莎的爱情，作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作为一个西欧派，在这里他完全遵循别林斯基的遗教。别林斯基曾说过：“不论在文学中还是在生活中，异国的、从外国引进的内容，任何时候也不能代替自己民族的内容的空白。”别林斯基不反对借鉴西欧的先进文化，但认为必须依据民族精神加以改造。他不相信“丧失民族性的民族在政治和国家方面有稳固存在的可能”。

在写作《贵族之家》时，屠格涅夫风华正茂，才力方遒，他所锤炼的“新手法”也正臻于完美，书中主人公的气质、情绪乃至感受又多和他吻合，写来得心应手——这一切保证了这部小说的成功。

然而，乍然读来，首先令人感到这部杰作在谋篇布局上似乎

有点呆板：在玛丽亚、马尔法、潘申、莱姆等人物初次登场时，我们都听到大段的“画外音”，平铺直叙地介绍他们的身世和个性；拉夫列茨基的前史，更显得冗长（一共九章），类似小说中的小说。但前者是由于作家重视环境对于人物性格形成的影响，后者还因为适应作品主题的需要而描述贵族之家的兴衰。作者以艺术家的勇气，敢于使形式服务于内容的需要；同时，他也不无艺术上的考虑：全书叙述的范围近一个半世纪，而作品的情节则集中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间，要不是这样插叙，就得扩大叙述的空间和时间，或者通过人物的反复回忆——而这些都是违反他的诗学的。

细心的读者不难感到，全书结构严整，脉络分明，疏密有致，而且有不少匠心独运的地方。例如丽莎的前史并不安排在她登场时，而在第三十五章。这一章正处于书中爱情故事的情势由顺境转入逆境，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由“结”到“解”的“突转”之处（参阅《诗学》）。它所叙述的是丽莎的宗教感情形成的原因，而她的宗教感情则是这场悲剧的决定性因素（虽然不是唯一的）。这也就是说，作家把这场悲剧的决定性因素巧妙地安排在悲剧的转折点上。

同样，米哈列维奇的来访被安排在第二十五章也值得玩味。他的到来，主要是批评拉夫列茨基懒散，规劝他振作起来，有所作为；临别时说：“我看你正需要一个纯洁的、天使般的人儿，来把你从这种冷漠麻痹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此前（第二十四章）拉夫列茨基和丽莎已经两心相印，这一忠告对他跨出求爱的一步正好起了推动作用；在这之后，当他明确意识到自己真正爱上丽莎时（第三十一章），他有点犹豫，懒得把“心”再一次“交到一个女人手里”，但马上转念：“丽莎跟那一个可不一样”，她

“会鼓舞我去从事正直、严肃的劳动”。可见这第二十五章正好位于拉夫列茨基的爱情的关键时刻。

作为悲剧，《贵族之家》据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区分，是“复杂的行动”，即通过“发现”与“突转”“而达到结局的行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发现”与“突转”“必须是由情节的结构中产生出来，成为前事的必然的或可然的结果”；而“发现”如与“突转”同时出现则是“最好的发现”。《贵族之家》恰好如此。它的“发现”——即由不知（不知瓦尔瓦拉未死）到知（因她归来才知道她未死），同时就是“突转”——两位主人公从此由顺境转入逆境。而她的死耗的误传和她的归来，又都是“可然”的。因此这出悲剧是符合《诗学》的要求的。

《贵族之家》可以说有两条线索，它们是平行的，又是交叉的，并且是互相转化的。两条线索先是拉夫列茨基-瓦尔瓦拉（在小说中间部分她虽不出场，却作为潜在的人物令人感到她在场）和潘申-丽莎；随着情节的开展，两条线索上的人物互相转换：丽莎和瓦尔瓦拉换位。如果说两条线索的外在联系是亲戚关系，那么其内在联系则是作品的主题（见上文）。两者有机地融合一起，天衣无缝。

有人说《贵族之家》中情节进展缓慢，似乎是适应庄园生活的缓慢进程。其实不然。小说中的故事延续了两个多月，而实际上只发生在几天之间。从第一章到第七章，人物几乎全部登场，总共只在一天之间；中间部分稍稍舒缓，这是因为爱情的萌生和发展，总得必要的时间，很少有一见钟情，立订终身。由第三十四章到最后的第四十五章（除了第三十五章），则是繁弦急管，急转直下：从拉夫列茨基和丽莎定情到瓦尔瓦拉归来，直到丽莎决定去修道院，总共只有五天，即使包括拉夫列茨基送瓦

尔瓦拉去拉夫里基，一共也只七天。在全书里，往往是情势突变，波澜迭起。拉夫列茨基在送丽莎回家的途中，幻想“在另一种情况下”他和她结合的可能性，第二天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从报上看到瓦尔瓦拉的死讯；接着，他和潘申辩论后，当夜立即和丽莎确定了爱情，不料第二天就见到瓦尔瓦拉的归来。这样，他们的爱情有如春梦，一夜间仿佛可成为现实，一夜间即化为泡影。书中有些地方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丽莎拒绝潘申求婚之日，正是瓦尔瓦拉回来之时，幸福的希望紧紧伴随着不幸的阴影；而在同一天内，她刚因拒绝潘申而为玛丽亚所斥责，又以头一天晚上和拉夫列茨基幽会而受马尔法的冒骂；紧接着在翌晨，她从拉夫列茨基的信里惊悉瓦尔瓦拉的归来，两小时以后她又不得不带着痛苦的冲动去会见瓦尔瓦拉。时间是这么集中，情势是这么突兀变幻，而作者的笔触却从容不迫，舒卷自如。

刻画人物性格，屠格涅夫喜爱使用对照法，在《贵族之家》中，由于爱憎比较强烈，更多的是使用反衬法。拉夫列茨基和潘申，丽莎和瓦尔瓦拉，马尔法和玛丽亚，形成鲜明的对照。作家还借助人物的眼光，进行多角度的评价。例如关于潘申的看法，既有格杰奥诺夫斯基、玛丽亚、瓦尔瓦拉的，又有马尔法、莱姆、拉夫列茨基、丽莎的。同时，这些人物关于潘申的评价，又是各自自己性格的折射。屠格涅夫有时也让人物自我暴露。潘申十分圆滑，从不感情从事，却说自己常常粗心大意，以“无心的”蠢话冒犯别人；他从心底藐视莱姆，却装着笑脸去拥抱他。瓦尔瓦拉称玛丽亚为“救星”，私下里却用法语嘲弄她；她对丈夫说自己时常悔恨欲死，却变得比过去更白嫩丰腴。在这些地方，作家不加任何褒贬，只是把他们放在艺术镜子前面，还他们以本来面目。使用这些方法，作家也是为了对现实持客观态度，避免主观

的介入。这种客观叙述，是他的“新手法”之一，而客观地再现现实则是他一贯刻意追求的。皮萨列夫在谈到《贵族之家》时说：屠格涅夫“在自己的长篇中不告诉我们应该有的，他对我们表现本来有的”。当然，在这个长篇中，作家也没有排斥主观的直接评价；即使客观叙述，字里行间也不免带有感情色彩。

不写心理过程，不写内心深处无穷的、矛盾的意识之流，被认为是屠格涅夫的弱点。其实这是由于他的才能特点，也由于他的创作技法。他喜爱并善于“从外面”描写人物内心变化过程。丽莎会见瓦尔瓦拉的前前后后的心情，便是一例。关于拉夫列茨基发现妻子有外遇时的情绪波动，更是刻画细致，比喻生动。最初，地板在他脚下颠簸起来，他像站在风暴中的船只甲板上，他又叫又呻吟，同时哭出声来；不久后，他失神地望着地板，似乎黑暗的旋风向他扑来，他感到自己仿佛沉向无底的深渊；后来，他到处乱跑，时时突然停止，绝望地摊开双手，一会儿发狂地愤怒，一会儿又觉得可笑和有趣；有时感到心头压着一块大石头，有时感到全身战栗和瑟缩；他猛然回忆起她在情夫面前唱歌时的表情，想把他们双双杀死；忽而又觉得一切不过是一场恶梦，甚至只是无稽的幻想，只要向周围望望，一切就会……而当他果真向周围望一望时，深深的苦痛就像鹰爪抓住小鸟似的，更深深地扎进他的心里。人物的情绪复杂起伏，连同他的生理反应，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其不同于现代意识流的是，这里只是用虚线勾勒出简明的轮廓，那里则把虚线连缀成凌乱的线团，而用以连缀的则正好是屠格涅夫所厌弃的“过分琐碎的想法”、“毫无必要的大量模糊的概念”和“谁也不需要的嘟嘟囔囔”。《贵族之家》也不乏写得成功的内心独白，如拉夫列茨基在返回庄园途中和回到庄园后的两段沉思（分别见第十八、二十章）。特别是前者，它穿插着作者的